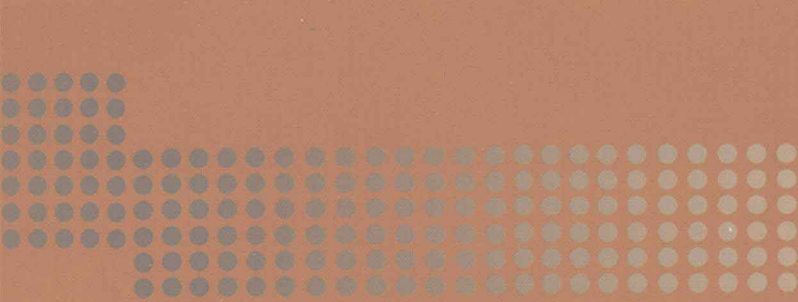




开放与城市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

郭大松 刘溪 主编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Urban Modernization

山东人民出版社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Urban Modernization

开放与城市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

郭大松 刘溪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与城市现代化: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 / 郭大松,刘溪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7-209-05838-4

I. ①开… II. ①郭…②刘… III. ①城市现代化—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F299.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5865 号

责任编辑:王海玲

封面设计:张 晋

开放与城市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

郭大松 刘溪 主编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26.5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838-4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谭延伟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克奇 仇世林 田海林

刘 溪 杜凤山 杜朝伟

张 宏 张声斋 赵 民

郭大松 盖志芳

主 编：郭大松 刘 溪

副主编：田海林 盖志芳

目 录

“挑战与回应：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商志晓/1

“挑战与回应：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谭延伟/4

李鸿章与袁世凯对山东巡抚周馥施政方针的影响 包德威/6

袁世凯与济南城市早期现代化 张华腾/22

济南开埠与对德国文明的“观摩受益” 王守中/35

铁路与济南城市的近代变迁 秦熠/46

胶济铁路与山东区域城市化发展研究 林吉玲/70

从被动到“被动中的主动”：晚清开埠制度变迁论纲 李玉/81

晚清自开商埠的转变时期（1900~1904） 张建伟/95

济南开埠与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城市比较研究

——兼谈鲍德威先生对济南开埠后经济发展的认识 董建霞/131

自开商埠对济南的积极影响及其原因 包爱芹/141

安身立命：晚清“浊流”周馥家族的文化追求 季培刚/150

论周馥在山东巡抚时期的经济改革举措 汪志国/167

试论义和团后周馥与直隶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 于建胜/175

两江总督周馥与晚清宗法语境下的捐产助学 王天根/184

周馥交游述论 张登德/195

周馥民生思想与实践 罗衍军/208

青岛华新纱厂福利慈善事业研究 刘佳慧/215

周氏家族与青岛华新纱厂 马文杰/235

周志俊与华新青厂 徐畅 贾琳/243

“一城两制”

——济南从开埠到建市期间的城市治理体制 杜学霞/267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以济南为中心 马德坤/282

近代济南的慈善机构 王林/295

低度发展：开埠以来济南城市手工业的变迁（1904～1937） 孟玲洲 杨鹏/310

近代济南城市环境卫生事业初探（1902～1937） 于静/324

济南市民社会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 王醒/336

历史悬案：马可·波罗是否到过济南 辛益/345

济南城市史研究综述 盖志芳/359

赫德与中英商约谈判 张志勇/375

20世纪济南城市广场的历史变迁 曹文明/387

中国现代城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周锡瑞/402

“挑战与回应：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研讨会评议 郭大松/410

“挑战与回应：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商志晓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在秋风送爽的金秋10月，在风景如画的泉城济南，由山东师范大学与济南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挑战与回应：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隆重开幕了。这是山东师范大学、济南社会科学界和山东史学界的一件盛事。在此，我谨代表山东师范大学对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向给予本次会议大力支持的济南市委、济南市政府及各兄弟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从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子崖算起，齐鲁都会济南作为城市迄今已有约四千年的悠久历史。1904年，济南“在城外自开通商口岸”，即开辟新城区，设立“商埠”。自此，济南从传统闭关走向现代开放，城市布局也由城市中心模式发展为旧城与新埠并存的“双核”模式，成为中国近现代城市主动对外开放的典范名城，成为清末、民国时期在华北仅次于北京、天津的第三大都市，为中国城市的转型和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因此，济南近现代城市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山东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成立最早的高校之一。从广义的历史角度上探讨，追根溯源，山东师范大学与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与济南“自开商埠”时期的“清末山东新政”，也有割不断的历史文化渊源。周馥任山东巡抚时期，不仅在济南“自开商埠”，还于1902年10月在“山东大学堂”内设立了“师范馆”，这是山东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最早的师范教育机构。1903年“山东师范学堂”的成立标志着山东法定正规师范教育的开始。到1910年，山东全省共设优级师范1所、初级师范15所、1年毕业的师范传习所44处，山东近代师范教育体制基本确立。由此，山东师范大学的史前史也应该与此大有关系。1950年10月，在原华东大学教育学院和山东省行政干校的基础上，山东师范学院组建成立。1952年，原齐鲁大学的物理、化学、

生物三系并入。1958年,学校的体育系、艺术系相继分离出去,分别建成山东体育学院和山东艺术学院。1970年,学校机关及部分系部迁至聊城办学,直至1974年,机关及大部分系部由聊城迁回济南,同时筹建了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即现聊城大学前身)。1981年,经教育部、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学校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

再过10多天,山东师范大学将迎来60华诞。建校60年来,山东师大植根齐鲁文化之沃土,汲取泉城之灵韵,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熔铸了“尊贤尚功、奋发有为”的校园精神,形成了“弘德明志、博学笃行”的校训和“爱国爱校,为人师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谱写了以创新发展、教书育人为主旋律的华美篇章,发展成为一所融教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理学等9大学科门类于一体,具有鲜明教师教育特色、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水平较高的综合性高等院校,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和山东人文学术重镇,为全国、山东省的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教兴鲁、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目前,山东师范大学分两个校区办学,占地面积4000余亩。学校现有23个学院,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2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69个本科专业;拥有1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7个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学科;是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批准的教育硕士、公共管理硕士、艺术硕士、体育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等12个专业学位培养单位。学校设有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基础实验室4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实验室5个,山东省重点建设实验室5个,山东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学校现有教职工2600多人,全日制在校生近35000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近4500人。另有成人教育学生12000余人。学校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外国留学生定点招生单位,已先后与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合作关系。

作为驻济高校,山东师范大学始终把为济南城市的建设发展服务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济南城市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欣喜和自豪。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山东师范大学与济南市共谋发展、合作双赢的又一次成功例证。以此为契机,我们还将联合成立“济南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以“中心”为依托,推进城市发展研究的深入开展,同时也使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更好地贴近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参加这次会议的大都是史学界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其中很多是我们的

老朋友，我们在多年的交流与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值此，真诚地希望各位新老朋友，更多地了解山东师范大学，继续关心和支持山东师范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积极为即将成立的“济南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作为“济南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创办方之一，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把“中心”打造成专家学者之家，为城市发展学术研究、为社会科学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最后，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来宾在济期间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挑战与回应：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中共济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谭延伟

尊敬的商书记、巩市长，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会议代表们：

值此金秋 10 月，我们非常高兴地迎来了国内外 60 多位专家学者，在我们“天下泉城”——济南市，首次举办以济南近现代城市发展为研究专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共同研讨济南商埠文化相关的历史和现实课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此，我谨代表这次会议主办方之一的济南市委宣传部，向各位领导和来宾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最新考古发现表明，济南的建城史可以上溯 4000 年。从城子崖开始，济南旧城经历了历下古城堡、秦汉历城县城、魏晋南北朝“双子城”、齐州“母子”州城和济南府城的演变过程。济南自开商埠以前一直保持着政治文化中心的职能。1904 年，济南自开商埠，揭开了向近现代城市发展的新篇章。这期间，胶济、津浦铁路在济南相继贯通，带动了商埠的兴起与发展，也创造了中西合璧的商埠文化。以商埠为代表的工商业在近代济南城市发展中逐渐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时间，济南成为商贾云集、八方辐辏的区域经济中心，大大推进了原来旧城外围地区的城市化和整个济南的近代化进程，为济南现当代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个多世纪之前，正当胶济、津浦铁路铺建逼近济南之时，周馥等一批有识之士敏锐地把握住了济南向开放的近代化城市转型的历史机遇；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建设中的京沪高铁纵贯济南，作为齐鲁都会的济南已经敏锐把握到了新一轮城市扩张和建设浪潮的机遇，济南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总体战略，通过城市扩张，积极发挥济南对沿黄和中原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努力把济南打造成联系环渤海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的枢纽城市和黄河中下游区域性中心城市。

我们召开这次研讨会之前，曾邀请了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驻济高等院校和文化科研单位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过多次座谈和论证。

在筹备期间，曾得到了以商书记为首的山东师范大学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际著名城市史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荣休教授鲍德威先生、著名近代史研究学者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郭大松先生、山东师范大学的田海林教授，以及省内外不少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并陆续寄来专稿 60 余篇。作为主办单位，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这次会议，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开展商埠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弘扬创新、进取、包容的商埠精神，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即将揭牌成立的“济南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为济南市弘扬商埠文化和加强城市化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对济南城市发展和商埠文化研究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提高济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济南文化软实力、促进济南文化和学术事业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会期间，我们殷切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更多地给我们传经送宝，介绍学术研究的成果和经验；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勇于突破，坦诚切磋；敢于用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从新的角度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有力推动济南商埠文化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不断走向深入。我相信，在与会人员的通力合作下，这次会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10 月是泉城济南的旅游黄金季节，此刻的泉城山河雄秀，湖泉多姿。我们下榻的锦绣山庄，北依会仙山，南望锦绣川，是一片颇能代表济南南部山区风貌的灵秀之所，欢迎各位在纵论商埠文化之余，纵情饱览济南的水光山色。我衷心祝愿各位专家学者与会期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最后，祝本次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李鸿章与袁世凯对山东巡抚周馥施政方针的影响

威斯康星大学米尔沃基分校 包德威^①

山东师范大学 郭大松译



周馥，1902 年照

周馥是晚清一位成功的现代化官员，他的官场生涯极大地依赖于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支持。周馥尤其擅长贯彻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在1902年~1904年间山东巡抚任内的成就，包括开放济南对外贸易和供外国人居住，是他一生长期遵循李鸿章和袁世凯确立的政策之典型表现。

^① David D. Buck,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 年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张汉等译)一书的作者，汉译姓名为鲍德威。查早年 David D. Buck 汉译姓名为包德威，经 David D. Buck 先生同意，这里采用早年的汉译姓名。

周馥是晚清很多官员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努力抵制外来势力侵夺中国的主权，但又继续支持满洲王朝，既不是一个汉族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一位革命者。在官场和个人生活中，他坚持做一位正直官员的主流标准。周馥任山东巡抚期间，采取适当步骤，落实了开济南为商埠、辟周村和潍县为分埠的计划，并因开辟济南为商埠而没有扩大外国的条约权利受世人称道。不过，这些政策完全是遵循袁世凯的既定方针并由与周馥治理模式相似的官员接力完成的。尽管如此，问题也很清楚，周馥是济南城市现代化的引路人。

一、背景

周馥在1902年5月28日出任山东巡抚之前，曾担任直隶布政使。自1870年代以来，李鸿章无疑是当时在华北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官僚集团、甚至可说是一个党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权力源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以及对清王朝的忠诚。尽管他们那一代人在如何应对外来挑战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的主张，但李鸿章、袁世凯和周馥都赞同学习西方技艺和军事体制，稳健推进现代化。

袁世凯和周馥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僚集团的杰出人物。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清政府朝鲜政策的灾难性失败，目睹了由此导致的中华帝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令世人震惊地惨败于日本。周馥自认这次失败乃奇耻大辱，于1895年5月自请开缺回到了安徽老家，直至1899年1月才重新出山，共赋闲了三个半年头。这次出山是受李鸿章之命，助李治理山东黄河洪灾。因周馥是华北经验丰富和备受信赖的治洪治河专家，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并得以进京陛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举荐周馥出任河道总督，但李鸿章和周馥本人均断然婉拒，结果周馥被派往四川出任该省布政使。

袁世凯甲午战争后官场生涯要比周馥顺达，这很可能与他在戊戌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而朝廷对他的军事领导才能也颇为器重。他是19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军事改革的主要人物。1898年，荣禄受命整编清廷北洋各军，组建了一支称为武卫军的新型军事力量。袁世凯统领新编武卫军的一部（武卫右军，即袁世凯在天津编练的新军，又称“新建陆军”——译者）。他统领的这一部很可能是武卫军五个军中（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最富战斗力和最先进的一支部队。1899年，在排外的山东巡抚毓贤去职之后，袁世凯受命出任山东巡抚，率领他的军队开赴山东，主要使命是阻挡德国

在那里的扩张。

1899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直隶和山东农村秩序极度混乱。袁世凯和周馥都在各自任内镇压这一著名的排外运动。数月之后，当清廷于1900年春季鼓励官方承认义和拳会为合法民间团练时，袁世凯和周馥均置之不理。

当义和团运动的灾害于1900年夏秋趋近尾声时，清廷转变政策，再次启用李鸿章出面处理外交事务。此时的李鸿章年老体衰，有病在身。他接受任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在四川的周馥赴直隶出任布政使。在周馥抵达北京和清廷开始迅速调整北洋关键官员职位之前，李鸿章便去世了。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逃离北京的慈禧太后和清廷，在李鸿章1901年11月7日辞世后特别依赖袁世凯和周馥来帮助拯救清王朝。袁世凯从山东巡抚升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却把他的新军第五镇留在了山东。周馥在天津参与解决外国关于义和团运动引发的一系列要求的谈判后，接替当时没能有力抵抗德国在山东扩张权利企图的张人骏^①出任山东巡抚。

1899年~1901年，袁世凯在任职山东巡抚两年间，已经宣示了以山东省城济南为中心推进现代化的计划。当时山东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德国，因德国当局似乎决心要将其新租借地胶州湾的势力扩展至山东内地。

周馥实施了袁世凯创设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供外人居住和经商的特别城区计划。这一特别城区完全由中国人管理，提供包括健全市政、警察保安制度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周馥制定了完善的规划，以至在他1904年离任之后，由他开启的发展势头，使济南成为中国人控制城市发展的非同寻常的典型。

作为个人，周馥在许多方面是晚清他那一代人的代表。他忠于清王朝，成功地镇压过国内叛乱，推崇官方宋代理学（Song Neo-Confucianism），愿意效法西方，尤其是西方军事和技艺领域。他追随李鸿章、袁世凯，事业卓有成效。作为一名长于在中国采用外国技艺和制度的新式成功官员，周馥是出色的，没有科举功名，亦与众不同。周馥不仅仅是个人事业成功，他的儿辈，特别是周学熙，20世纪20年代以父亲同样的方式继续着成功的事业。周馥出任山东巡抚，开启了许多官员和城市平民为使济南成为一座现代发达城

^① 石约翰：《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John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p. 151、196。

市数十年奋斗不息的时代。

二、跟随李鸿章之早期幕僚生涯及与袁世凯的交往

1902年5月,周馥受命出任山东巡抚,8月初抵达济南。这时他64岁,距自请开缺回籍5年。虽然他的老上司和恩师去世仅6个月,但这一次周馥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名至实归。他与袁世凯也有交往,而且是姻亲。当时的袁世凯是与他同一时期的李鸿章北洋官僚集团中最杰出的一位。^①

周馥出任山东巡抚之际,正值袁世凯作为中国领导人掌控局势的巅峰时期。^②很显然,作为官员,袁世凯更重要,也更有权势,不过,袁和周都属于改革派和现代化派。与周馥相比,袁世凯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经历更广一些,同时人们还认为他是一位军事领导人。周馥的履历上虽没有袁世凯那些显要职位,但他在技术领域包括治洪、财政事务以及发展现代通信业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在设计和建设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设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周馥有相当丰富的外交经验,但他从来不是一个成功的实战军事将领。

根据现代专长来说,周馥似乎是一位能够处理复杂技术问题和管理财政预算的可信赖的官员。他的高级管理职位,相当于一名副部长——负责主要工程的最高级别官员。李鸿章有很多幕僚襄赞各种事务,做文案,任职淮军军官,但周馥显示出了建立李鸿章自强计划所需要的商业和工业的专门才华。袁世凯则享有现代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声誉。作为外交家,袁世凯的政策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记录。

关于李鸿章对周馥的巨大影响,肯尼斯·福尔瑟姆写道:“在李鸿章幕府中,跟随他时间最长的人是周馥。”“周馥的生涯是李鸿章庞大幕府集团成员

① 汪志国:《周馥与晚清社会》,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我的根据是王志国做的年表,而不是周馥的《周恂慎公全集》中更详细的资料。另可见崔瑞德、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第11卷,《晚清史》下册,陈锦江《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pp.416~462(Wellington K. K. Chan. “Government, Merchants and Industry to 1911”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416~462)关于李鸿章创办实业方式的评价。

② 麦金农:《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Stephen R.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参见该书关于袁世凯1901~1908年间权力的评价。

命运的生动写照，这些幕僚一生从未达到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的程度。他们承担李鸿章幕府中的繁重事务，忠心耿耿为李效命，业绩显著，但得到的最大回报只是中级官员的职位。”^①

周馥出身安徽农村贫苦农家，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1860年，周氏家族结盟抵抗太平军，周馥由此与李鸿章建立了联系。那一年他23岁，因精于书信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般认为李鸿章让他做文案，立即就对他和他的做事能力产生了好感。^②

周馥和袁世凯都应视为1885~1916年间北洋重要人物。这期间的重大事件，涉及清王朝的挫败和李鸿章的西化大计。甲午战争清政府灾难性的失败，袁世凯和周馥都有重要责任。但是，袁世凯在战前朝鲜外交和战争爆发后的外交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周馥在甲午战争中承担的则是他典型职业生涯任务，为中国军队调配后勤供应，实际上是清朝在东北军队的军需官。北洋海军在威海卫惨败于日本，军队、战舰以及周馥为之建设的所有设施均毁于一旦，但周馥并不承担海军战败的责任。

很显然，袁世凯推迟了周馥出任山东巡抚的任命。袁本人1901年12月匆忙离任山东巡抚，以便取代在前一个月去世的李鸿章在直隶的位置。袁任东抚时的布政使张人骏（1846~1927），受命代袁署理东抚。张人骏是李鸿章北洋系官僚集团的另一成员，多年来与袁世凯关系密切。^③

周馥和袁世凯还有密切的私人关系。周馥的一个女儿——瑞珠，早在幼年即与袁世凯的一个儿子袁克轸订了婚。他们是在袁死后成的亲。周馥的第四个儿子周学熙，自袁世凯1899年出任山东巡抚时起，就与袁紧密合作。1912年北京共和政府组建后，直至1916年袁世凯去世，袁为周学熙争取到了直隶和北京的一些关键经济职位。周馥和周学熙的确是晚清和民初父子职业生涯均获成功的非同寻常的范例。从某些方面来说，周馥的声誉得益于周学熙所取得的成就。

人生终了，两人之间差距也不很大。袁复辟帝制梦碎，众叛亲离悻悻去世，而周馥则在天津过着富有舒适的寓公生活。1921年周馥以84岁高龄离

① 肯尼斯·福尔瑟姆：《友人、幕宾、同僚：晚清幕府制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Kenneth E. 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pp. 141、142。

② 汪志国前揭书。

③ 张人骏离开山东后，开始了完全不同的职业生涯，包括其1907~1909年间参与拟定《大清刑律草案》。

世。他身后有一个兴旺、成功的大家族，拥有相当多的地产。出众的儿子们

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袁世凯比周馥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袁世凯更有雄心，但他甲午中日战争前在朝鲜政策的失败，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暗中拆台行为，处境艰难的共和国总统职位，以及帝制梦的破灭，令他声誉扫地。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袁在1909年被逼退职之前的清末改革期间（1901~1911），还是一个进步、有建树的人物。

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期间，可谓星光灿烂。当1907年北京满洲年轻领导人剥夺了他对新建陆军的控制权之后，袁世凯便黯然失色了。不过，他在清廷中依然是个强势人物。^①

尽管周馥离开山东后在上海和广州升职了，但他在70岁两广总督任上退休了。他要求退休的理由是年龄和健康。1907年时他70岁，那时他的身体很好。周馥退休后又悠闲自在地活了14年。

周馥官声很好，尽管如此，他的批评者还是抱怨他偏爱安徽人，说他的四个儿子科举考试都成功了不正常。然而，我没有发现有人说他敛财。不过，周馥及其家族在他为官期间极其昌盛。根据可利用的档案记录，周馥和周学熙都在盐业方面谋取了某些经济利益。1892年，周馥派周学熙参与食盐垄断业，而早在1886年，周馥本人即曾调署长芦盐运使。周学熙后来也担任过长芦盐运使。而后在1895~1899年退职期间，周馥在扬州建了一套别墅，扬州地处中国盐业的中心。在与中国商人和投资人合作开发开滦煤矿过程中，他展示了相当程度的首创精神。周馥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铁路的一部分股权，但这只是象征性的承诺，并非是严肃的投资。^②他的儿子周学熙在这些基础上进而摒弃了“官督商办”模式，兴办转向了股份公司制的新式工业。

周馥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多大的财政成就，以及周学熙在财政方面的娴熟专长有多少得益于他，尚不清楚。但他们密切持久的关系，说明父子在政治和经济事业上是紧密合作的。

一般说来，袁世凯和周家父子在政治事务中所走的道路相同，但周家父子

① 亚瑟·W. 胡梅尔编：《清代杰出中国人》，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版，第二卷（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Vol. 2), p. 950。另见麦金农前揭书。

② David D. Buck, *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 44~45.